

國共鬥爭下的自由主義（1941-1949）

陳儀深*

摘要

本文研究1941年新四軍事件以後，迄1949年中國大陸易幟爲止，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處在國共兩大勢力的夾縫中，作了怎樣的抉擇？產生怎樣的分化？並探討其原因，評價其結果。

作者根據「個人與權力中心的距離」，並從歷史事實中歸納而出，把1940年代的自由主義分成「個人諫諍」、「組黨介入」、「公共論壇」等三種類型，分別以胡適、張君勱、儲安平代表之。這時期的胡適選擇反共的、親國民黨的立場，比較缺少戰前尤其《新月》時代的抗議精神；張君勱以反對黨的身份參加國民參政會、籌組民主（政團）同盟，在國共摩擦之際奔走和平，並以其專業知識襄贊制憲事業，卻因民社黨參加違反政協決議之國民大會，而引致不小的批評；儲安平主編《觀察》週刊，集結一批出色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撰文呼籲和平、關切社會主義、批評國共兩黨不合自由民主價值之處，惟仍不能挽大廈於將傾，恐怕是「記錄」的意義大於「匡正」的作用。

1940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不同於清末民初嚴復、梁啟超之受限於集體主義，亦不同於五四時代之著重「文化」自由主義，他們爲典型「政治」自由主義的長短作了鮮活的見證。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國共鬥爭下的自由主義（1941-1949）

陳儀深

引論：民國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

一、一九四〇年代中國的政治情勢

二、國共鬥爭下的三種自由主義

（一）個人諫評類型：胡適為例

（二）組黨介入類型：張君勱（國家社會黨）為例

（三）公共論壇類型：儲安平（《觀察》週刊）為例

三、結論與評估

引論：民國以來的自由主義傳統

自由主義（Liberalism）一詞源於英國，它作為一種思想、一種運動，由於總是與實際政治相結合，所以它的內容也常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而改變。但是若把自由主義解釋為一種愛好自由、追求自由的習性，一種由中庸、自制、妥協所表現出來的性格或風格⁽¹⁾，那麼在東方與西方的知識份子身上，都不難找到一條淵遠流長的傳統。

中國古代知識份子一方面以仕（做官）為專業、為本分，另一方面又設定一些出仕與否的規矩，例如孔子所謂的「學而優則仕」、「邦有道則現、無道則隱」。

(1) 詳見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著，李弘祺譯，*中國的自由傳統*（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引言頁8-10。

，孟子更是身體力行，彰顯孔子的這些道理⁽²⁾。用今天的話說：可以有所作為的時候就出來從事政治活動，否則就「隱道於民」——轉而從事文化教育活動，以俟諸來日。之所以必須如此「嚴進退」，主要是為保持獨立自主的發言位置，以維繫道德理想於不墜。到了二十世紀，儘管經過 1905 年廢除科舉、1912 年清帝退位而民國成立，中國社會在制度上沒有了皇帝，在觀念上或許三綱五常的情結亦逐漸消散，但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於做官不做官、「文化乎？政治乎？」的問題，依然感到焦慮，這不但牽涉個人性格、價值的取捨，並且牽涉為了救國所應採取之策略的選擇，而這些取捨和選擇，莫不與自由主義密切關聯。

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胡適為例，他在 1917 年甫從美國結束學業返回中國之際，即已認定：（關於中國問題的解決）知識和文化的更新應該優先於政治改革，在一個令人滿意的政治方案實現之前，（先決條件是）舊的社會價值應被新的取代⁽³⁾。胡適的此種看法至少有兩方面的基礎，一是就一般而言他認為一個知識份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是對政治採取「不感興趣的興趣」（disinterested-interest，或譯非關利益的興趣？），所以在他一生之中除了中日戰爭期間擔任四年的駐美大使之外，他堅持不做官的原則⁽⁴⁾；另一是就戊戌變政以來的教訓而言，他認為康、梁等知識份子幾乎把所有的希望投注在政治，從而忽略了非政治層面的課題，如教育民眾、解放婦女、改革學校、重塑家庭制度……，這種「忽略」應該是政治改革失敗的主因之一⁽⁵⁾。這一段歷史教訓還可以從梁啟超的自述中得到佐證，即 1918 年年底梁氏準備遊歐之前，在上海：「是晚我們和張東蓀、黃溯初談了一個通宵，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換了一個新生命了。」⁽⁶⁾

基於以上的心理背景，胡適在 1918 年參加《新青年》雜誌編委會之際，即曾向他的同事們建議「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幹政治」，他說：「我們這個文化運動既然被稱為『文藝復興運動』，它就應撇開政治，有意識地為新中國打下一個非政治的（文化）基礎。我們應致力於（研究和解決）我們所認為最基本的

(2) 關於孟子對於知識份子人格氣概之鼓舞，參見胡秋原，*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份子*（台北：學術出版社，1978 年四版），頁 171-172。

(3) 參見胡適，「歸國雜感」，*胡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3 年），第一集，頁 621-628。以及 Jerome B. 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Taipei: Rainbow-Bridge Book Co., reprinted, 1980), p.175。

(4) 康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36。

(5) Jerome B. Grieder, *op. cit.*, p.177。

(6) 丁文江，*梁任公年譜長編*（台北：世界書局，1972 年再版），下冊，頁 552。

有關中國知識、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問題。」⁽⁷⁾他的同事們一度很尊重他的建議，以致對政治甚為關注的陳獨秀等人遂另辦一份《每週評論》的刊物，來批評時事和推動政治改革，以便《新青年》可以繼續避免作政治性的評論。不過當1919年陳獨秀被捕，胡適代編《每週評論》的時候，終因「看不過了、忍不住了」而發表他一生政論的導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⁸⁾

胡適這篇文章立刻引起藍志先（藍公武，1887-1957，時任「國民公報」編輯）和北大教授李大釗（1889-1927）的反駁。雙方的歧異點——簡單地說——在於胡適認為空談一些外來進口的抽象主義不但無用而且很危險，會使人以為找到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而就不必費心去研究實際問題的解決；藍、李二人則認為主義的危險並不是主義本身使然，而是空談它、假冒它的人所造成的，其實在解決實際問題之前，先談論主義是必要的，主義的研究和鼓吹，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⁹⁾。這一場「問題與主義」的論戰，表現出自由主義者與（馬克思）社會主義者之間、言論家與行動家之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鴻溝，難怪胡適後來把這一場論爭稱作「我和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回合」⁽¹⁰⁾。筆者要指出的是，五四時期的新文化自由主義者，先是對於知識份子參與政治的妥適性產生質疑，繼則在不得不參與政治的時候，對於「點滴改革或革命變遷」的方法問題亦必須作出抉擇。

然而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主要還是表現在白話文、批評孔教、輸入新學說、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等文化運動方面，相較之下，當國民黨完成北伐軍事，中國進入所謂「訓政時期」以後，則有較多「政治」自由主義的發揮。這是因為1928年以後的中國比較像一個統一的國家，有一個可以期待、可以批評、可以「要求」的中央政府，或許這也是（胡適的朋友）蔣夢麟、蔣廷黻、翁文灝等人紛紛去做官的原因。其次，中外關係的重點已經從「列強」轉為「日本」一國，尤其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侵略的壓力是明顯、持續而且幾乎是立即的，這種情勢更容易引起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緊張關係，而成為三〇年代自由主義的一項

(7) 唐德剛譯註，前揭書，頁195。

(8) 開始談論政治的原因之一，應是胡適的好友丁文江（1887-1935）的影響，丁文江向來主張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是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丁文江果然在1922年參加創刊《努力週報》並且成為該政論刊物的靈魂人物。詳見胡適作品集第23，丁文江的傳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頁58。

(9)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附錄藍志先先生問題與主義」、「附錄李大釗先生再論問題與主義」、「三論問題與主義」，皆見於胡適文存，第一集，頁342-373。

(10) 唐德剛譯註，前揭書，頁195。

特色。

所謂訓政，不論基於什麼巧妙高尚的理由，實質上總是一個黨對政權的壟斷，而難以得到普遍的贊同。訓政初期攻擊國民黨最力的政論，要數胡適和羅隆基（字努生，1896-1965）在《新月月刊》所發表的文字；尤其胡適在發表過「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等文章以後，不但（1929年10月）受到國民政府教育部來的訓令予以「糾正」⁽¹¹⁾，並且還傳出「上海市黨部決議要嚴辦」的風聲，要不是他的朋友如蔡元培、吳稚暉、羅家倫、王寵惠乃至宋子文等人「在朝為官」，恐怕國民黨政府不會那樣「曲予優容」⁽¹²⁾。由於《新月月刊》內容的文學性高於政治性，並且出刊的狀況甚不穩定⁽¹³⁾，雖然到1933年6月才告停刊，但是要論193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的代表性論壇，自非《獨立評論》莫屬。《獨立評論》週刊1932年5月出版第一期，迄1937年7月停刊，共出了244期，主要的撰稿者如胡適、丁文江、蔣廷黻、吳景超、陳之邁、陶希聖、蕭公權等人皆係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的教授，該刊在創刊號上宣示：「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這是獨立的精神。」⁽¹⁴⁾大致而言，《獨立評論》廣續《新月月刊》對國民黨訓政的批評，且因政治學者張佛泉、蕭公權、張奚若的加入，使得批評帶有較多的學術氣味；對於日趨緊張的中日關係以及隨之而來的學生運動，《獨立評論》基本上是採取「不趕時髦」的立場，用丁文江的話說：「應該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之內與日本妥協」⁽¹⁵⁾，「我們決不跟著一班不負責任的人喊口號，要求政府出兵收復東北失地。因為目前的問題，不是收復失地，是要保存將失未失、似失未失的地。」⁽¹⁶⁾不過該刊也曾因為一篇「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的文章觸怒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而被下令停刊（四個多月以後才又復刊）⁽¹⁷⁾。由於《獨

(11) 梁錫華選註，胡適秘藏書信選（台北：遠景出版公司，1982年），續篇，頁874。這是附在「胡適致蔣夢麟」書信之後的「教育部訓令」中的措詞，當時胡適是中國公學校長，蔣氏是教育部長。

(12) Jerome B.Grieder, *op. cit.*, p.244。以及朱文華，胡適評傳（重慶出版社，1988年），頁218-219。

(13) 詳見張麗珍，「新月月刊」的政治言論（國立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6月），頁9-14。

(14) 關於獨立評論的內容分析、撰稿人排名、創刊緣由等等，詳見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年），頁6-17。

(15) 丁文江，「假如我是蔣介石」，獨立評論第三十五號（1933年1月15日），頁2。

(16) 丁文江，「抗日剿匪與中央的政局」，獨立評論第十九號（1932年9月25日），頁8。

(17) 該文係由張奚若所寫，張氏認為「華北特殊化」的局面不是日本單方面所能造成的，而是中國的地方當局先利用國際背景造成冀察的「特殊」局面，中央當局又過於畏忌而承認此等「特殊」局面使然；他說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以後，一切設施都是向造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方向走，且已造成種種禍國的事實而不

立評論》在外交方面採取比較低調的立場，逢到「閩變」、「兩廣異動」之類的事件發生時也都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場說話⁽¹⁸⁾，不免予人「保守」甚至「右派」的印象。⁽¹⁹⁾

由上所述，可知在「民主」而非「君主」的時代，知識份子追求理想的出路較為寬廣，至少不必再走鑽營政府職位的老路。除了獨來獨往、著書立說的類型以外，民國以來的自由主義者，最常採取辦同人雜誌——建立公共論壇——的方式以表達意見、以影響政治，辦雜誌就是直接訴諸人民，「就是要以知識份子與老百姓的關係為基礎，來確立現代知識份子的新身份。」⁽²⁰⁾ 諸如五四時代的《新青年》、《每週評論》、《努力週報》，1920年代的《現代評論》、《新月月刊》，1930年代的《獨立評論》，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分別代表當時代的自由主義思潮。至於組織普通政黨以參與政治，在一般民主社會雖屬常態，但是在國民黨訓政（一黨專政）的時期，則是困難重重；若以組織革命政黨的方式以相對應（如共產黨一般），似又偏離自由主義的本色。這種情況直到中日戰爭爆發以後，國民黨為了「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而與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交換文件」⁽²¹⁾，並且成立了容納各黨派的、具有「戰時國會」性質的「國民參政會」，才有了改觀。

不但中日戰爭造成形式上的黨禁開放，戰爭後期以及戰後的國共鬥爭，更開啓了「政治協商」之類的歷史因緣，使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更多機會直接介入實際政治。然而更多機會的另一面即是更多考驗，1941年（新四軍事件）之後，國、共兩黨互不相容，知識份子在兩大勢力的夾縫中，作了怎樣的抉擇？產生怎樣

自知。文見獨立評論第二二九號（1936年11月29日），頁2-4。

- (18) 1933年發生閩變的時候，胡適寫「福建的大變局」，指責參與閩變的是一群同床異夢的軍人政客，並且說無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內戰的大罪惡。獨立評論第七十九號（1933年12月3日），頁2-4。1936年發生「兩廣異動」，譴責的文章有胡適的「親者所痛，仇者所快！」君衡的「以中國攻中國？」陳之邁的「論粵桂的異動」，俱載於獨立評論第二〇六號（1936年6月21日）。另有張熙若「對於兩廣異動應有的認識」，載於獨立評論第二〇七號（1936年6月28日）。張氏說從整個國家的立場看來，白崇禧、李宗仁、陳濟棠等均為民族的罪人，國家的叛徒。
- (19) 獨立評論的社員任鴻雋曾經寫一篇「我們是右派嗎？」發表在獨立評論第四十八號（1933年4月30日），文中提到「獨立評論的同人既不會高唱激昂的論調，又不會專做責人無已的文章，如果因此得著右派的嫌疑，我們也無法推辭的。」
- (20) 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著，梅寅生譯，顧頡剛與中國新史學（台北：華世出版社，1984年），頁7。
- (21) 1938年4月13日張君勱代表國家社會黨致函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副總裁汪精衛，說明國社黨的主要政綱乃與孫中山之三民主義「措詞容有不同，而精神則並無二致」；汪、蔣於4月15日覆函表示今後願「遇事承商，以期抗戰期中言行一致」。一般認為這是互相承認、也是開放黨禁的開始。函件全文見楊永乾，張君勱傳（作者出版，1993年），頁110-114。

的分化？誠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可惜迄今為止研究成果不多⁽²²⁾，本文的撰寫，盼能在這方面有所彌補。

本文將 1940 年代國共鬥爭下的自由主義，分成個人諫諍、組黨介入、公共論壇等三種類型，一方面是根據「個人與權力中心的距離」而作劃分，一方面是從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事實中歸納而得。事實上 1947 年傅斯年向胡適商榷自由主義者的「辦法與命運」的時候，即說到「我們自己要有辦法，一入政府即全無辦法。與其入政府，不如組黨；與其組黨，不如辦報。」⁽²³⁾大致也是環繞著這三種類型而作抉擇。至於其中以儲安平主編之《觀察》週刊代表第三類型，應屬較無爭議；以胡適代表第一類型，乃因胡適是極少數得以接近權力中心說話的知識份子之一，並且他是諫諍角色自居的人。而對於國共之間企圖走第三條路、並組織團體參加奔走和平的諸多知識份子之中，個人之所以主張以張君勱為代表，乃因他對英美式民主憲政之應行、能行於中國極具信心且極富熱心（不像梁漱溟那般懷疑⁽²⁴⁾），並且在性格上比較中庸平和（不像羅隆基那般激越⁽²⁵⁾）。

一、一九四〇年代中國的政治情勢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中國朝野相當一致地堅持「精神能勝物質」的信念、支持「用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²⁶⁾，並且在抵禦外侮的心理需求下，使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達到高峰⁽²⁷⁾，這是裝備、戰力居於劣勢的中國竟能撐了八年而把日本拖垮的「內因」。「外緣」方面，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把美、英、荷等西方國家捲入戰局，使中國苦撐待變的希望成為事實，日本終於在 1945 年 8 月遭受美國原子彈攻擊以後宣佈投降。胡適曾經如此描述自助而後人助

(22) 值得注意的是，汪榮祖教授的近作，見 Young-Tsu Wong, "The Fate of Liberalism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hu Anping and His Circle, 1946-1950", *Modern China* (October 1993), Vol.19, No.4, pp.457-490。

(23) 「傅斯年致胡適」，梁錫華選註，前揭書，正篇，頁 204。

(24) 梁漱溟不但在 1930 年代認為要求國民黨開放憲政是「不急之務」，而且在 1947 年說：「今天所要行的憲政，卻仍然是外國制度，於固有文化無據，於當前事實不合。」見陳儀深，前揭書，頁 208-218。及梁漱溟，「預告選災，追論憲政」，觀察週刊第三卷第四期、第五期（1947 年 9 月 20 日、27 日），頁 5-10，8-11。

(25) 自由主義者通常就事論事，沒有固定的偏左或偏右，而羅隆基比較是「固定偏左」的。其次，羅隆基也是國社黨員，但要論組黨當然是黨魁比黨員更有代表性。

(26) 頗有學者認為這是抗戰獲致最後勝利的最大憑藉與原因。詳見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編纂，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一輯第九冊：第二次中日戰爭（台北：正中書局，1973 年台五版），導論頁 7。

(27) 關於八年抗戰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影響，見陳儀深，「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發表於「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合辦，1994 年 1 月 12-14 日），頁 14-18。

的過程：

中國作戰了一年半之後才獲得美國第一次貸款。我們作戰兩年兩個月之後歐洲大戰爆發。我們作戰了三年八個月之後才能夠包括在能享受1941年3月租借法案的國家之內。我們作戰了整整四年之後英美政府才開始凍結日本資產，並且對日本施行全面的禁運。我們作戰了四年五個月之後才找到並肩作戰的新盟邦。(28)

然而中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面對了兩條戰線，即在抗日之外，還有共產黨「擁兵自重」的問題。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不但增強了國民政府抗日的能力，並且助長其對付共產黨的決心，1941年1月國民黨軍隊襲擊並擊潰了共產黨的新四軍，繼而佔領沿長江一帶有爭議的地區，就是在羅斯福總統剛剛批准一億美元的軍事貸款給中國之後所發生的事(29)。不論美國政府願不願意、或自不自覺，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它仍然一步一步捲入國共鬥爭的漩渦中。

1944年9月美國總統的特使赫爾利抵達重慶，他奉命使華的任務是：「阻止國民政府崩潰，扶持蔣介石的領導，統一中國軍隊，並盡可能地協助政府實現開明化，創造有利於建立一個自由、統一、民主的中國的條件。」(30)這時候赫爾利對於共產黨這個武裝政黨雖然有所戒慎，但已贊成盡力說服國民黨政府讓共產黨合法化並參加組成政府。蔣介石對於美國官方代表企圖直接與共產黨接觸不以為然，認為那是被「共匪」宣傳所迷惑(31)，不過在美國的堅持之下，1944年6月以後有一個美國官方的觀察小組進入延安，翌年二月這個小組的成員做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所目睹的華北共產黨得到民眾支持的證據是這樣廣泛和明顯，已經不能再認為這僅僅是為了欺騙外國來訪者的一場表演。」「那裏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氛和力量，一種與敵人交手的願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32)這一類的訊息傳至華盛頓，自然在一定程度會影響美國的中國政策。

1947年6月，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仍然認為，中華民國政府是「反對蘇聯在亞洲的擴張目標的唯一的統一的力量」，而反對蘇聯擴張乃符合美國之軍

(28)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第五冊，頁1776。

(29) Michael Schaller 著，王揚子、劉湖譯，二十世紀的美國和中國（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頁60-61。

(30) 「駐華大使（赫爾利）致羅斯福總統電」，收入資中筠，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和發展（1945-1950）（重慶出版社，1987年），附錄三～6，頁402-403。

(31)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台北：未出版，1978年），卷五（下），頁482。

(32) 這是美軍延安觀察組的報告之一，收入資中筠，前揭書，附錄二～3，頁397。

事利益，所以主張給中華民國政府足夠的軍事援助，以便有效抵抗共產黨在中國的擴張⁽³³⁾。但是當1948年9月，美國國務院「重新審議對華政策」的時候，已經認為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力量非常衰落，而瀕臨輸掉這場與中國共產黨的長期鬥爭，如果美國「全力以赴地援助」也許可能扭轉中國內戰的此一趨勢，但是美國政府之所以不能進行「全力以赴地援助」，至少有以下兩個理由：(一)全力以赴地援助等於是公開干涉，公開干涉會引起中國內部反蔣勢力的反彈，「各種派別的新興民族主義和中國傳統的排外主義可能會同共產黨人結成聯盟」，換言之，美國的公開干涉雖然將在軍事上加強蔣，但卻會在政治上加強共產黨⁽³⁴⁾。(二)即使美國在政治和財政上付出重大代價，使共產黨在戰場上被擊敗，國民政府成爲一個統一的中國的最高統治者，那時又當如何？「我們能保證國民政府不會很快再次垮下來，倒在我們身上嗎？我們的行動並沒有根治革命的起因，有什麼保證革命不會從頭再來一遍？」⁽³⁵⁾

此外，儘管國民黨方面指控東北接收問題係中共與蘇聯「勾結」⁽³⁶⁾，並且中共得到蘇聯的軍火支持⁽³⁷⁾，但是根據美國官方觀察員的調查報告，除了蘇聯佔領滿洲期間中共得到的「日本武器和裝備」以外，沒有證據顯示蘇聯向中共提供了軍事裝備；1947年10月美國駐北平總領事也認為「蘇聯給予滿洲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迄今爲止是非直接的，而且絕對數量極其有限。」⁽³⁸⁾其次，美國駐上海總領事認為美國的干涉遠比俄國公開得多，例如對日戰爭剛結束，美國就運用自己的運輸工具將成千上萬的國民黨軍隊運送到日本撤出的戰略地點，以便國民黨能比共產黨搶先佔領這些地點；美國派遣海軍陸戰隊保持平津鐵路暢通，並在青島駐

(33) 「參謀長聯席會議致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報告」，收入資中筠，前揭書，附錄六～17，頁432。

(34) 其實美國還沒有「全力以赴地援助」，就已經引起自由派知識份子的不滿，例如1947年儲安平就質問：「在過去幾年中，到底是蘇聯控制中國的色彩濃厚，還是美國控制中國的色彩濃厚？」見氏著，「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觀察週刊第三卷第九期（1947年10月25日），頁3-4。同年吳世昌也說：「如果美國索性不管中國的事，美軍一起撤出中國，中國的情形要簡單得多，國內問題也自有一個解決之道。」見氏著，「論當前的政局和美國對華政策」，觀察週刊第三卷第五期（1947年9月27日），頁5。

(35) 「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備忘錄：重審並制定對華政策」，收入資中筠，前揭書，附錄八～21，頁448-449。

(36) 秦孝儀編，前揭書，卷六（上），頁80。

(37) 孫科在1947年夏秋之間屢次發表談話，表示「共軍得有蘇聯軍火支持」，「如果美國不迅速而有效的支援國民政府，政府得考慮與蘇聯合作。」引自吳世昌，前揭文，頁4。

(38) 「駐北平總領事（柯樂博）致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信」，收入資中筠，前揭書，附錄八～23，頁456。

紮海軍；美國還給了國民黨大批的經濟和軍事援助，但什麼也沒給共產黨。至於蘇聯撤出滿洲時是曾將繳獲的大批日本武器彈藥交給中共，但是根據馬歇爾將軍的聲明，美國轉交給國民黨的「繳獲的日本武器彈藥」數量要更大⁽³⁹⁾。

以上敘述中日戰爭期間及戰後的美國、國民黨、中共三角關係，可以發現1940年代國共之間勢力的此消彼長，最後終於由中共獲勝，主要的因素應不在於外國「帝國主義」的介入，而是在於中國內部，尤其是國民政府自身的弊病缺失。其次，以上的敘述可以引出與自由主義相關的一個重要背景，即是當時的自由主義者因為戰爭反而增多發揮作用的機會，這不但從1938年7月成立的國民參政會，爲了「集中力量、挽救危亡」而容納各黨派代表及無黨派的知名人士，可以看出此種「機會」；另外從美國「有條件」援助國民政府的方式可知，要把國民黨政權改變得更爲「開明」，使得受過美國式教育的自由派知識份子起更大的作用，乃是美國政府一貫的想法，1947年馬歇爾離華所發表的最後聲明就曾提出：「對於時局之挽救，繫於自由主義者在政府中和在少數黨中擔起領導作用。」⁽⁴⁰⁾

自由主義者何所憑藉而能挽救這樣的頹局？無非是指促使國共之間的紛爭，得以和平的、政治的（而非武力的）方式解決。當1941年春發生皖南新四軍事件以後，張君勱、左舜生、梁漱溟、張瀾、黃炎培等人因恐國共摩擦影響抗戰建國，乃謀集中第三者之力量，爲有效的調和，於是在1941年10月10日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⁴¹⁾，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將該組織改名爲「中國民主同盟」，改團體會員制爲個人參加。該同盟奔走於國共之間，參加戰後之政治協商會議，相當影響戰後數年之政治發展。

1946年政治協商會議之得以召開，除了由於美國方面的調停介入以外，一方面要歸因於共產黨在中日戰爭期間已日益壯大，另一方面要歸因於在野民主黨派——尤指民主同盟、或稱「第三方面」——的鼓吹，他們一再要求國共兩黨承諾「從事政治解決而不用兵」。中日戰爭結束以後，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到達重慶停留41天，其間國共雙方進行了五次會談，而有「雙十會談紀要」的發佈，其中主張「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集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

(39) 「駐上海總領事（卡波特）致遠東司長（巴特沃思）信」，收入資中筠，前揭書，附錄八～23，頁456。

(40) 詳見資中筠，前揭書，頁216。

(41) 梁漱溟等人早在爲新四軍事件奔走調停的許多聚會之間，就秘密進行著「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組織工作，3月19日，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成立大會，但成立宣言及對時局主張綱領則選擇在雙十節發表。見李淵庭、閻秉華編寫，梁漱溟年譜（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37、138、142。

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⁴²⁾。依照政協會議的召開辦法，規定會員名額為38人，開會時以國民政府主席為主席，對於商定事項則由會議主席提請國民政府實施。其中會員之分配情形，計為第一方面國民黨八人，第二方面共產黨七人，第三方面民主同盟九人，第四方面青年黨五人，第五方面社會賢達（無黨無派）九人。以上一至四方面之會員係由各該黨派自行推定，第五方面會員則由一至四方面共同推定，而均由國民政府主席聘任。這五方面的派性結構，自然是環繞著國、共兩黨而展開的，其中第五方面以親國民黨的成員居多，青年黨右傾，而民主同盟左傾——甚至被認為是中共的「工具」，但是依當時屬於「社會賢達」之一的王雲五的分析：「民盟的構成分子甚為複雜，除一部分傾向中共外，其明白大義，能與國民黨合作者亦不乏其人。」⁽⁴³⁾無論如何，用歷史學者沈雲龍的話說：國共兩黨之間的歷史恩怨人盡皆知，其他政團也可說是集過去所謂「反動派」或「反革命」之大成，隨時可以「危害民國罪」繩之於法的，如今卻聚集在一起開「政治協商會議」，商討國家大計，不能不說是現實需要所造成的——一大奇蹟。⁽⁴⁴⁾

純就政協會議本身而言，由於成員甚具代表性、過程合乎民主原則、議題討論切中要害，很難說是一次失敗的會議⁽⁴⁵⁾。難怪參加會議的梁漱溟，在會議閉幕席上宣布退出現實政治，隨後撰文表示樂觀：「今幸內戰停止，協商告成，中國有步入坦途之望。」⁽⁴⁶⁾可是，會議結論能否實現，才是關鍵所在。首先，政協會議對於五五憲草提出的十二項修改原則，涉及國民大會無形化、責任內閣制、省憲制度等，與國民黨的「總理遺教」出入頗大，遂一一在國民黨的六屆二中全會中受到「修正」，因而引起周恩來在三月十八日（國民黨中全會閉幕的第二天）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對國民黨的違背政協決議提出嚴厲的指責⁽⁴⁷⁾。其次，關於政府組成問題，由於過渡時期的政府採委員制，國民政府委員名額經商定為40人，其中半數由國民黨人員充任，半數由其他黨派及社會賢達充任，這些非國民黨

(42) 「雙十會談紀要」，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四冊，頁405-407。

(43) 王雲五，「政治協商會議追記」，岫廬論國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183。

(44) 沈雲龍，「政治協商會議的面面觀」，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411。

(45) 詳見陳儀深，「民國卅五年政治協商會議述評」，歷史月刊第廿八期（1990年5月1日），頁104-111。

(46) 李淵庭、閻秉華編寫，前揭書，頁164。

(47) 懷恩，周總理生平大事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290。

人員構成之 20 名國府委員如何分配？由於國府委員會對一般事項係以出席之過半數為通過，若涉及（政協決議之）施政綱領之變更則須出席之三分之二贊成始得通過，因而中共堅持其與民盟必須合佔 14 名，即達三分之一以上以便在必要時阻止政協決議之施政綱領受到變更。此項要求無法得到國民黨、青年黨及無黨派人士之同意，以致後來中共拒絕參加聯合政府，而再啓戰端。其實，即使中共及民盟的國府委員名額合計達到 14 名，亦只能消極地阻止政協會議的決議遭到變更，無法積極主導通過任何國民黨所不欲的議案，而國民黨堅守城池毫不讓步，是否擺明著即將變更政協會議的決議？姑不論中共是否絕無組成聯合政府的誠意，國民黨在此關口該讓未讓，未免授人以柄。

政協會議結束之後不到半個月，蔣介石及其夫人在上海市政府舉行記者招待會，曾經回答記者的詢問說：「中共若不欲放棄其私有軍隊，則此次政治協商會議之一切努力，均歸無效，而政治協商會議之決議，亦等於具文！」⁽⁴⁸⁾然而在中共方面的邏輯則是：要實現還軍於國——即中共軍隊「國家化」，必先還政於民——即國民黨先開放政權、建立民主政府，否則在沒有憲法、沒有民選國會的情況下，所謂政府軍其實也是國民黨的「私有軍隊」。面對這樣的難局，當時的國共兩黨領袖，似沒有足夠的智慧和胸襟來化解，終又兵戎相見，打個你死我活。

二、國共鬥爭下的三種自由主義

(一)個人諫諍類型：胡適為例

胡適曾在 1933 年 4 月，爲了婉拒「做官」的邀請，復信給當時的行政院長汪精衛，說他自信「在政府外邊能爲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爲更多」，而且「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在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爲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換句話說，他只願「爲國家做一個諍臣，爲政府做一個諍友。」⁽⁴⁹⁾胡適此時選擇扮演這樣的角色，應不必如某些學者所言「完全滑到右派一邊去」⁽⁵⁰⁾，亦不至於成爲「蔣介石政權的僕役」⁽⁵¹⁾，因爲就在同一年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中，胡適明白地站在民主的立場，並且勇敢地說：「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今

(48) 秦孝儀編，前揭書，卷六（上），頁 50。

(49) 「胡適致汪精衛」，梁錫華選註，前揭書，正篇，頁 59-60。

(50) 石原臯認爲 1920 年代《現代評論》階段的胡適尚屬中間偏右，到了 1930 年代《獨立評論》的階段，就完全滑到右派一邊去了。見氏著，閑話胡適（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142。

(51) “Hu Shih”, in Howard L. Boorman, (ed.)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Vol.1, p.173。

日的領袖，無論是那一黨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52)這當然是把蔣介石也包括在內了。其次，1935年胡適又曾公開批評蔣介石「最大缺點在於他不能把自己的權限明白規定，在於他愛干涉到他的職權以外的事。……其實這不是獨裁，只是打雜；這不是總攬萬機，只是侵官。」(53)以當時的時代空氣，而能做這樣的批評，可見三〇年代中日戰前的胡適仍具有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抗議精神。

中日戰爭爆發，促使胡適接受「徵召」出任駐美大使，從1938年到1942年的四年大使生活中，雖然有一段時間「絕不參與機要，從不看出一個電報，從不聽見一句大計，故無可進言」(54)，但是或許由於身份的關係，他在美國仍盡力為國民政府辯護。例如1941年發生的皖南新四軍事件，國軍的襲擊使中共損兵折將，遭受抗戰以來「空前所未有的大挫折」(55)，這種內戰未免減損中國抗戰的實力，胡適在美國則公開宣稱「新四軍之解散，為軍紀上必要之舉動」(56)。或許也因為這樣，1945年3月國民政府發表的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代表名單，胡適即名列其中，同年九月又被推舉為北大校長，1946年3月被推為國民大會代表（後又被推為大會主席），在在顯示胡適依然受到倚重。

戰後中國多變的政局中，胡適與實際政治的關係有增無減，尤其到了1948年3、4月之交，蔣介石要王世杰去商洽胡適出任總統候選人(57)，同年12月中蔣氏又派陶希聖飛往北平去敦請胡適出任行政院長(58)，可說是此種「關係」的高峰。儘管在先一年（1947年）年底胡適即曾向王世杰表示不願放棄學術工作而改行從政，因為那是「用其所短而棄其所長」(59)，但是1948年面對「總統」候選人的機會，胡適不免會動搖起來(60)，後來國民黨臨中全會決定推蔣介石為第一屆總統

(52) 胡適，「再論建國與專制」，獨立評論第八十二號（1933年12月24日），頁4。

(53) 胡適，「政制改革的大路」，獨立評論第一六三號（1935年8月11日），頁8。

(54) 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五冊，頁1776-1777。

(55)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9。

(56) 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五冊，頁1716。

(57) 同上註，第六冊，頁2022。以及秦孝儀編，前揭書，卷七（上），頁68-72。

(58) 陶希聖，「關於敦請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長及其他」，傳記文學第廿八卷第五期（1976年5月），頁18。

(59) 耿雲志，胡適年譜（香港：中華書局，1986年），頁195。

(60) 1948年3月30日王世杰傳達蔣介石的意思時，胡適「頗為猶疑，但允考慮後答覆」；第二天夜裏王世杰續勸，胡適就說「讓蔣主席決定」，表示可以接受了；4月1日則又請王世杰轉達「最好能另覓他人」的附帶意見。詳見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六冊，頁2022-2024。

候選人，胡適才「如釋重負」⁽⁶¹⁾。事實上早在1947年1月蔣介石即曾透過傅斯年擬邀請胡適出任國府委員兼考試院長，此時胡適已有「不夠堅定」之意，傅斯年乃警告他「政府今日尚無真正開明、改變作風的象徵，一切恐為美國壓力，裝飾一下子」，而且，此時胡適若加入國府委員會無異「大糞堆上插一朵花」⁽⁶²⁾，胡適才決定留在北大。

具有國大代表身份的北大校長胡適，對於戰後洶湧的學潮或有一定程度的抑止作用。胡適在1946年9月就任北大校長，10月10日在北大開學典禮的講話，就引述宋代理學家呂祖謙的名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來勉勵學生，這一句話的深意，在翌年5月4日當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學生紛紛集會進行反內戰、反飢餓示威時，胡適手擬的一份布告內容，有了適當的闡釋：

至於同學們對現實政治自由發表意見，我們當然不反對。但政治問題都是很複雜的，都不是短時期能解決的，更不是學生罷課所能立刻收效的。所以我們很誠懇的希望同學們鄭重考慮，切不可犧牲學業的方式，作政治的要求。⁽⁶³⁾

胡適還不至於如蔣介石一般，認定學生運動「是受共產黨直接間接策動」，他承認學生干預政治是因政治不上軌道，人們不滿現狀的結果，只是他反對用罷課方法來干預政治⁽⁶⁴⁾。同年6月他還引用易卜生的話對青年人說：「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⁶⁵⁾對於美國軍人皮爾遜強姦北大女生沈崇乙案，美國海軍部竟判決無罪釋放，胡適為了平息反美浪潮，也是極力去區辨法律問題和政治問題，同時勸告「學生要解決思想苦悶，惟有埋頭研究學術。」⁽⁶⁶⁾然而，這些觀念的背後，已經不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或三〇年代戰前較為單純的環境，胡適個人也不是單純的啓蒙者或教育家，而是具有明確政治立場的

(61) 同上註，頁2025。

(62) 「傅斯年致胡適」，梁錫華選註，前揭書，正篇，頁202-205；以及頁210-212。由於蔣介石給胡適的信中說國府委員會「其職權大於參政會而性質則相同」，使胡適有些「動心」（傅的用語），傅斯年對此感到「萬分驚愕」，並說「此事全在先生一穎不動搖之心，我代辭多少次了，是無用的，……我們又不是一個政黨，誰也替誰保不了，只在自己而已。」

(63) 耿雲志，前揭書，頁192。這份布告在5月16日胡適主持的臨時行政會議上被追認，而5月18日蔣介石就發表文告指責學生係受共產黨策動，「干法亂紀」，將採取措施斷然處置。

(64) 同上註。

(65) 同上註，頁193。這是6月2日給北大學生鄧世華的回信內容，但6月22日據此而撰寫的「青年人的苦悶」一文，口氣稍有不同，參見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六冊，頁1975。

(66) 耿雲志，前揭書，頁194。

「準政治人物」(67)，以致上面這些看似自由主義的觀念，不免都帶著政治作用或政治色彩，從而減低了它的說服力。

1947年是國共內戰明朗化、白熱化的一年，胡適在這一年認真地發表了幾篇重要的政論。首先是5月份的文章：「眼前『兩個世界』的明朗化」，認為戰後美國與蘇聯的衝突以及兩個壁壘的形成，使得「兩個世界」的局勢因而明朗化，而明朗化可以免除彼此的誤解，正是全世界和平的新起點(68)。其次是7月發表的文章：「論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他把英、美、西歐式的政黨稱作甲式政黨，蘇俄、意、德諸國後起的政黨稱作乙式政黨，而中國國民黨當時準備結束訓政、推行憲政，乃是從乙式政黨要變為甲式政黨，他一方面呼籲這種轉變應該包括黨的內容與作風的根本改革，而不僅僅是幾個政黨分配各種選舉名額或官職地位，一方面稱讚「一個握有政權的政黨自動的讓出一部分政權，請別的政黨來參加，這是近世政治史上稀有的事。」(69)學者張忠棟認為，這篇文章要求黨內黨外共同走甲式政黨政治的民主道路，實際上已是「期望調和」的最後呼喚，等到8月1日發表「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才明顯放棄調和的立場，回到戰時曾經提過的民主對抗極權的主張(70)。但另有學者認為，7月這篇文章並不那麼中性，這從7月4日國民政府發布「勘亂動員令」的第二天胡適就對報界發表「擁護」的談話可以感知，其間還「毫無根據地」攻擊共產黨，說他的家鄉（安徽績溪）抗戰八年未遭破壞，而共產黨佔領三日即洗劫一空(71)。

「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是在北平中央電台的廣播講詞，主要的內容在肯定民主自由的趨向才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目標，一個明白方向」，而「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體專制」，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72)。這篇講詞頗引起一些批評，當時是天津北洋大學三年級學生的陳之藩，即寫信給胡適，表示像「民主自由是大潮流，赤潮是一個小迴波，……這類詞句，不該出於胡先生之口。因為這類潮流啦，迴波啦，只是一些政治的口號……」

(67) 中國大陸的學者甚至認為胡適是第三次國內戰爭期間支持國民黨政權的「戰犯」，見朱文華，前揭書，頁296。

(68) 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六冊，頁1970-1972。

(69) 同上註，頁1978-1981。

(70) 張忠棟，「在動亂中堅持民主」，胡適五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年），頁241。

(71) 同年12月11日，有以績溪全縣民眾名義印發的傳單寄胡適，謂由於他出面向當局請兵到家鄉「剿匪」，結果民眾大遭殃，而對胡提出譴責。皆見耿雲志，前揭書，頁193、195。

(72) 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六冊，頁1986。

(73) 爲了答覆這種質疑，胡適遂以更堅決的語氣，在8月24日發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一文，文中承認他的基本立場是要「偏袒」那個自由民主的潮流，他批評那個專制集團不敢和別的國家自由交通，不容許自己的人民自由出國，還迷信只有在世界的紛亂中才可以得著自己的安全保障，這樣「開歷史的倒車，所以說是逆流；不自信，害怕而氣餒，所以說是小的反動」，尤其蘇聯在中國東北的行爲、在旅順大連的行爲，「處處是回到帝俄時代的侵略政策，這是崇拜彼得，崇拜伊凡的反動心理的當然結果。」最後胡適呼籲中國人必須認清世界文化的大趨勢，必須選定應該走的自由民主的方向。(74) 胡適這篇文章被認爲「是當時中國人面對尖銳對立衝突必須有所選擇的艱難時刻，一篇深具南針意味的代表性文獻。」(75) 可是當時另有著名的學者，持著不同的看法，例如北大政治系教授錢端升，在1947年也發表過相關議題的文章，他說根據種種分析：「我們實在看不出蘇聯有威脅我們安全獨立的企圖，甚至連重要的可能衝突，也是找不出來。所謂衝突也者，三之二是我們自己內部的紛亂及無能，六之一則已經有了條約的協議，只餘六之一方是懸案」，錢端升認爲像拆運戰利品這樣的懸案，雖對中國東北的復興造成重大打擊，但並不能構成反蘇的理由(76)。其次，如國立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也在1948年初發表一篇文章，說他主張和平、主張協商，反對把蘇俄看成侵略國家(77)，因而引起胡適的反駁(78)。

筆者認爲，當時的蘇俄是不是一個侵略國家，是不是有威脅中國安全獨立的企圖，似有著「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一面，但是胡適藉著批評蘇俄（專制集團）、肯定自由民主的方式，以表達其在國共內戰中支持國民黨的立場，意圖是很明顯的。問題在，反對專制與反對中共或許比較一致，而支持國民黨就等於支持自由民主嗎？再者，胡適所欣賞的美國並不那麼幫國民黨，所鄙薄的蘇聯並不那麼幫共產黨，這個事實難道胡適看不出來嗎？由此，吾人可以略窺：政治立場對一個自由主義者所可能產生的限制。

(73) 陳之藩，在春風裏（台北：文星書店，1962年），頁59-61。

(74) 這也是先作廣播演講之後，再在全國四十多家報紙發表的文章。由於1947年5月胡適曾邀北大、清華等校的一些教授組織「獨立時論社」，準備對國內外政治問題分頭撰寫文章，交全國各地有關係的報紙發表。陸續參加該社的有四十多人，建立關係的報館有卅八家。耿雲志認爲這是「在輿論上給蔣政權以最大的幫助」。見氏著，前揭書，頁192。文章見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六冊，頁1987-1990。

(75) 張忠棟，前揭書，頁245。

(76) 錢端升，「世界大勢與中國地位」，觀察週刊第二卷第三期（1947年3月15日），頁3-6。

(77) 周鯁生，「歷史會重演嗎？」轉載於中央週刊第十卷第九期（1948年2月19日），頁12-13。

(78) 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六冊，頁2014-2017。

(二)組黨介入類型：張君勱（國家社會黨）為例

上述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由於思想信仰與私人交往的關係，在國共鬥爭的局勢下，比較是與中共「勢不兩立」⁽⁷⁹⁾而站在國民黨的一邊。1941年成立的民主政團同盟，則是明揭調和國共摩擦的目標，自覺地要走第三條路，他們雖然在1944年改名民主同盟而以個人身份組成，但是這些個人的背後，大率仍有著團體的屬性，其中除了政治色彩較淡的中華職教社、鄉村建設協會以及範圍較狹的救國會、東北救亡同志會以外，具有政黨形式的有國社黨、青年黨、第三黨（1947年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由於青年黨的核心主張在於反共的國家主義⁽⁸⁰⁾，第三黨是從國民黨分離出來而標榜革命的孫中山主義⁽⁸¹⁾，皆與自由主義距離較遠，故本文選取創建國家社會黨的張君勱，作為討論重點。

張君勱（1887-1969，本名嘉森，西方人習稱 Carsun Chang），江蘇嘉定人，1906年以公費赴日留學，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並結識梁啟超，1910年畢業返國，1911年得授翰林院庶吉士，1913-1915年以及1918-1922年，兩度在歐洲各國遊學，奠定其一生對民主憲政、議會政治、社會主義的思想與信仰。1947年張君勱嘗自述：「自我求學讀書之日，受西歐國家民主與憲法思想之影響特深，初未嘗因蘇俄共產主義之獲勝而稍變，更未嘗因法西斯主義之成功而躊躇，……惟我之信奉民主與社會主義三十年如一日。」⁽⁸²⁾

創辦雜誌以傳播思想，是張君勱一生的主要志業之一，包括1928年在上海創刊的《新路》、1932年在北平創刊的《再生》、1934年在香港創刊的《宇宙》、以及晚年在海外籌辦的《自由鐘》等，俱有一定的影響力。惟最能表現其民主信仰的，莫過於1932年創立「國家社會黨」的舉動，這是繼1928年公開抨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以致《新路》遭到停刊、個人遭受政治性綁架⁽⁸³⁾以後，再度以具

(79) 1947年2月，傅斯年寫給胡適的信中說：「自由主義者各自決定其辦法與命運。不過，假如先生問我意見，我可以說：一、我們與中共必成勢不兩立之勢，自玄學至人生觀，自理想至現實，無一同者。」見梁錫華選註，前揭書，正篇，頁204。

(80) 詳見李璜，學鈍室回憶錄，上卷（台北：傳記文學出版記，1973年），頁106-107。陳啓天，「國家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分歧點」，收入李義彬編，中國青年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頁154-159。

(81) 1930年鄧演達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正式建黨，名稱是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當時被稱為第三黨。詳見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中國國民黨派史文獻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頁339-432。

(82) 張君勱，「『立國之道』新版序」，立國之道（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總部，1947年四版）。

(83) 張君勱的經歷，詳見程文熙，「張君勱先生年表簡編初稿」，收入朱傳譽主編，張君勱傳記資料（二）（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頁251-270。關於《新路》雜誌的特色以及遭受國民黨查禁的緣由，可參考厚生，「君勱先生的政治思想（上）」，（香港）再生週刊第四卷第十八期（1953年8月15日）。

體的行動挑戰黨禁、實踐其民主政治的理想。張君勱所信仰的民主，有所謂「修正的民主方案」，他認為政府的行政重在敏捷與效率，社會和文化則應當任其自由，不應當犧牲自由以獲取效率；換句話說，集中和自由應求得平衡，表現在制度上，就是政府不因議會而動搖，議會不因其權力之過度而自取滅亡，這樣才能「在此權力主義與議會政治之紛爭中，求得一中道」⁽⁸⁴⁾。他所信仰的國家社會主義，即是「以民族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或「以社會公道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他反對納粹主義的種族偏見、亦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論，主要的理由都是妨礙全民族的團結；至於私有財產問題，張君勱認為社會主義制度下保留私有財產是可能的，中國要實行社會所有政策，可以國家資本為後盾，而不必效法蘇俄之沒收政策⁽⁸⁵⁾。總之，張君勱一方面對共產黨的主義不以為然，另一方面雖主張政治權力宜於集中，但所集中者以行政為限，絕不容許侵犯人民之思想自由，而「國民黨之所為，正與此相反」⁽⁸⁶⁾，在這樣的思想立場上，張君勱早已註定要走「第三條路」。

張君勱參與發起的民主同盟，雖有著調和國共摩擦的現實而迫切因素，但是他們作為「國共之間的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政治團體」，乃有一定的思想基礎，即在政治方面採取英美的較多，在經濟方面採取蘇聯的較多，並且「在今後國際間，英美與蘇俄的思想制度互相競賽的局面下，想保持一種平衡」。至於民主同盟為何被認為與共產黨較為接近？原因是：

各中間黨派在（向國民黨政府——筆者按）爭取民主的時候，旁邊站著一個在野的大政黨，且擁有相當大的力量，也要向在朝的國民黨爭取民主。過去同受壓迫，今日目標相同，那麼大家聯合起來，自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並且因為它的力量大，它說的話使人更為注意和重視，以致於共產黨以外的呼聲和口號都被淹沒了。殊不知，軍隊國家化、政治民主化和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最先是民主同盟提出的。……但只有人說民主同盟是共產黨的尾巴，而沒有人說共產黨是民主同盟的尾巴！⁽⁸⁷⁾

儘管國共雙方「談談打打」，軍事衝突不斷，國民黨仍想早日召開國民大會以

），頁 21-25。關於 1929 年的綁架何以是「政治性」，詳見楊永乾，前揭書，頁 78-79。

(84) 張君勱，前揭書，頁 138-159。

(85) 這是「國家社會主義綱領」中的主張，全文錄入楊永乾，前揭書，頁 82-96。

(86) 同上註，頁 90。

(87) 以上關於民盟的自我定位，見孫寶毅，「民主同盟是共產黨的尾巴嗎？」，再生週刊第一一〇期（1946 年 4 月 27 日），頁 5-6。

完成「制憲大業」。惟中共方面認為國民黨不遵守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且在國府委員名額分配問題上缺乏誠意，乃拒絕參加制憲國大。此時民主同盟方面如何因應？由於青年黨之宗旨與政綱具有明顯的反共性質，先已在1945年脫離民盟，而國家社會黨（1946年與海外民主憲政黨合併改組為民主社會黨）則一方面由於張君勱長久以來切望國民政府早日行憲，一方面認為民主同盟企圖以「袖手旁觀」逼成國共之和平，事實上是不可能的，所以為了「別尋政治途徑」⁽⁸⁸⁾，遂與青年黨雙雙參加國民大會。

民主同盟畢竟沒有參與制憲國大，因為他們認為制憲行憲必須在全國人民全國黨派和平團結之環境中始能完成：

國共兩黨正在進行中國歷史上空前激烈之內戰，……在此兵連禍結之情形下，猶謂國共雙方代表能平心靜氣共聚一堂，以討論國家基本大法，寧非幻想。若謂國民大會之舉行，不求全國各黨派之全數參加與合作，而以當權在位之國民黨單獨為之，一黨專政之局不改，全國統一之局不成，則憲法之尊嚴何在，憲法之效能何在？⁽⁸⁹⁾

從這個角度來看，民、青兩黨前去參加以討價還價方式分配黨派名額（而非以公民選舉方式產生）的國民大會，自會引起疵議。當時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就認為，國民黨之所以請民、青兩黨參加政府乃是「完全想利用他們作配角來演一齣喜劇」，因為國民黨必須依賴美國援助才能打贏內戰，而美國要求國民黨「民主」；「民主」當然不是國民黨一個黨表演得來的，「正在進退兩難的時候，民社黨和青年黨毛遂自薦，正如了國民黨的意。」⁽⁹⁰⁾

本來，這一群愛好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企圖在國共之間組成團體扮演「第三勢力」、走「中間路線」，希望把國民黨向左拉一些、把共產黨向右拉一些，「在這樣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國得到一個和諧與團結，並由團結得到統一。」⁽⁹¹⁾結果卻恰恰相反，這一群知識份子在國共兩大勢力的拉扯之下，不得不分向左右兩邊靠攏，終究讓「槍桿子」決定一切。這不能不說是「組黨參政」類型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一大挫敗。

(88) 張君勱，「答覆羅勞生沈衡山兩君評語」，再生週刊第一八五期（1947年10月11日），頁2-3。

(89) 「民盟代表團對召開國大事務致蔣主席電」，民主同盟文獻（上海：中國民主同盟總部，1946年12月），頁147-148。

(90) 季羨林，「忠告民社黨和青年黨」，觀察週刊第四卷第十三期（1948年5月22日），頁3-4。

(91) 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收入蔡尚思主編，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五卷，頁202-207。

先在1946年秋天，有《觀察》週刊記者批評張君勱「固為一彬彬有禮的長者，亦為一博學能文的學者，然而他領導組黨，數年以來，可謂無甚成就。」⁽⁹²⁾張君勱於是撰文反駁，除了對民國以來憑藉兵力與財權而獲致「成就」的政黨不以為然，同時自述「我輩深信民主者，辦報組黨，反對專政，為政府所禁，甚至被綁以去；在此期中只知反對一黨專政為『義之所在』，倘有絲毫成敗之見存於胸中，則惟有裹足不前而已。」⁽⁹³⁾隨後國大召開，民主社會黨提名參加，部份報紙遂以文字、漫畫對張君勱冷嘲熱罵，似非將其前途毀滅，不足快意；《觀察》週刊主編儲安平則有一篇較為持平的評論，他說「我們對於民社黨的參加國大是不贊成的，但是對於張氏的用心和動機是瞭解的」，因為國大既然勢在必開，憲法既然勢在必制，而張氏一生獻身立憲大業，則他自必較他人更關心這部憲法的內容，更期望早日行憲，所以他仍參加國大召開前夜在南京舉行的幾次審議憲草的會議，並與國民黨總裁交換函件：假定國民黨總裁能保證這部憲法在國大通過，他聲明他將同意他所領導的民社黨參加國大。張氏的用意是，和談須待從長努力，先將憲法通過了再說。不過，張君勱既然是以民盟代表的資格參加政協，而這次國大的召開，確與政協決議的程序不合，站在政協的立場，張氏實不應讓民社黨參加國大，尤其根據過去的經驗，掌權的國民黨人「總是不肯輕易放手」，所以黨外爭取民主的力量「不能自亂步驟，自相分化」，此次民社黨參加國大，「不啻捧國民黨的場而拆民盟的台，在大戰略上，實欠明智。」⁽⁹⁴⁾

對於張君勱的抉擇，有些偏頗的報導謂「民社黨變成張家升官發財的資本」⁽⁹⁵⁾，實則吾人對張氏的評價，若能查考其過去、默察其動機，並且對1949年以後流亡海外時期仍堅持的「傳統文化觀及近代主權屬於國民的民主理念」⁽⁹⁶⁾若有所瞭解，當會承認張氏是一位有理想、有操守的政治人物。

(三)公共論壇類型：儲安平（《觀察》週刊）為例

除了《再生》週刊這類的黨派刊物以外，若問1940年代的中國是否有賡續1930年代《獨立評論》那種書生論政方式的自由主義刊物？無疑地《觀察》週刊足以作為代表。

(92) 觀察通信版，「組黨傳說中，胡適的態度」，觀察週刊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9月1日），頁22。

(93) 張君勱，「答覆觀察週刊記者對我評語」，再生週刊第一二九期（1946年9月7日），頁9。

(94) 儲安平，「論張君勱」，觀察週刊第一卷第十九期（1947年1月4日），頁3-4。

(95) 引自夏康農著，論胡適與張君勱（上海：新知書店，1947年），頁53。

(96) 詳見薛化元，「張君勱對『中國前途』看法之研究」（1949-1969），淡江大學法政學報第一期（1993年7月），頁149-172。

《觀察》週刊從 1946 年 9 月 1 日創刊，開始發行五千份，自第十三期起增印至一萬份，至第二卷（每卷 24 期）即達約一萬六千份，至第三卷更達約二萬五千份，其間尚有再版乃至多版者，合計起來數目更爲可觀。由於該刊自我期許爲「帶有全國性的中心刊物」，社址雖設在上海，發行範圍卻遍及江浙、四川、華中、華北、華南，甚至平津、雲貴、西北等地⁽⁹⁷⁾。1948 年 11 月，該刊終因內容「攻擊政府、譏評國軍、爲匪宣傳、擾亂人心」的罪名而被查封，部分同仁被捕；十一個月以後，政治情勢改觀，《觀察》遂因中共中央的批示，而以「完全不同的面目」復刊⁽⁹⁸⁾。

《觀察》的主編（亦是主要發起人）儲安平（1909-? ⁽⁹⁹⁾，江蘇宜興人），1928 年迄 1932 年就讀於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後又曾就讀於燕京大學研究部，頗受當時著名的自由派學者胡適、徐志摩、羅隆基的影響。1936 年獲公費留學英國而註冊於倫敦經濟學院，留學期間對英國的憲政法治、人權自由印象深刻，使他相信自由主義是一個國家富強的根源，中國亦可以透過良好的教育方式以改造國民性格，進而建造一個民主的國家和自由的社會⁽¹⁰⁰⁾。儲安平一生中最能爲此理想獻身的光彩時段，無疑是在 1946-1948 年主持《觀察》筆政的這段期間。

《觀察》週刊的創刊號，即明白表示該刊「對於政府、執政黨、反對黨，都將作毫無偏袒的評論」，「只是公開的陳述和公開的批評，而非權謀或煽動。」⁽¹⁰¹⁾半年後，儲安平繼續宣稱該刊「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刊物」，因爲「在今日這種『兩趨極端』的局面下，我們最最需要提倡這種『自由』與『寬容』的精神。」⁽¹⁰²⁾在《觀察》週刊封面所列的七十位撰稿人中，著名的如馬寅初、張東蓀、費孝通、傅斯年、陳之邁、陳衡哲、錢端升、錢鍾書、潘光旦、蕭公權、吳世昌

(97) 詳見儲安平，「風浪、熬煉、撐住——『觀察』第三卷報告書」，觀察週刊第三卷第廿四期（1948 年 2 月 7 日），頁 3-8。以及儲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誕生、半年來的本刊」，觀察週刊第一卷第廿四期（1947 年 2 月 8 日），頁 3-9。

(98) 復刊後的《觀察》，除了許多原來的撰稿人不再爲它撰稿以外，並且內容有不少配合中共政策的文章——已不像自由主義的刊物。關於被查封的事，詳見「觀察社被國民黨反動政府迫害經過追記」，觀察（復刊號）第六卷第一期（1949 年 11 月 1 日），頁 32-34。

(99) 儲安平的卒年不易確定，只知道他在 1966 年即發生「文革」那一年失蹤，經中共官方到處調查無結果之後，於 1982 年由中央統戰部具函「正式做出死亡結論」。儲望華，「父親，你在那裏？——儲安平幼子自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寄來稿件」，傳記文學第五十五卷第二期（1989 年 8 月號），頁 59-61。

(100) 參見儲安平，「中國人與英國人」，英人、法人、中國人（上海：觀察社，1948 年），頁 69-113。以及 Young-Tzu Wong, *op. cit.*, p.464。

(101) 編者，「我們的志趣和態度」，觀察週刊第一卷第一期（1946 年 9 月 1 日），頁 3-4。

(102) 儲安平，「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誕生、半年來的本刊」（同前），頁 7。

、梁實秋等等，「凡非確實函允擔任者，我們未敢貿然將其姓名列出」，並且創刊半年以來即有三分之二為該刊寫過文章⁽¹⁰³⁾。

綜合而言，《觀察》週刊所呈現的自由主義，至少有以下三項特徵：

(一)呼籲和平：相對於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胡適（在8月6日）還勸蔣介石在大戰之前要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¹⁰⁴⁾，1948年國共內戰方酣的時候，胡適卻謂「和比戰難，要難上千倍萬倍，而和中共談和平，根本是妄想」，此種悲觀之論在當時被認為「與一般人認為中國的戰事任何一方面也不能殲滅對方，而最後必是一個和談結局的意見恰正相反」，而且與一般渴望和平的社會心理相違背⁽¹⁰⁵⁾。胡適大致認為和平的障礙是在中共方面，才會有上述說法。但是《觀察》週刊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必須先民主了，然後才能和平；必須先和平了，然後才能統一。」也就是認為責任首先在國民政府之不民主，而且「現在的應該呼籲和平，就像抗戰前的呼籲抗戰和抗戰時期的呼籲民主一樣，……可以充分相信，必有一樣的成功的前程。」⁽¹⁰⁶⁾由於國民政府對共產黨的和戰態度易因美國援助而趨於強硬，所以儘管是接受英美文化價值的知識份子，對美國亦不友善，1946年11月儲安平即曾說：「美國之支持國民政府，必須這個政府真能向民主之路進行。……我們實難發現任何足使美國必須支持今日中國這樣一個政府的理由。」⁽¹⁰⁷⁾「美軍繼續駐華確是一種不合事宜的行為。」⁽¹⁰⁸⁾

北京大學教授楊人梗，更從理論的角度指出，「自由主義者」一詞雖可用來指種種不同類型的人物，但是：自由主義者至少是不願有內戰的，因為他們是一些不憑藉武力來爭是非的人物。他批評「若干所謂自由主義者在為內戰之一方張目，這些人物無異已變成了國民黨或共產黨而非自由主義者。」⁽¹⁰⁸⁾ 如果看過前述胡適在1947年7月所發表「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以及8月所發表「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的文字所顯露的反共立場，就可知道楊人梗是意有所指了。

(二)重視經濟問題：《觀察》週刊上面直接以自由主義為題目的文章不少，其中甚為引人注目的是張東蓀所寫的一篇，他公開宣稱「政治的自由主義（即單純的自由主義或稱舊式的自由主義）在今天二十世紀已是過去了」，只是在文化與

(103) 同上註，頁4。

(104) 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五冊，頁1612。

(105) 董時進，「和真比戰難麼？」觀察週刊第五卷第十五期（1948年12月4日），頁1。

(106) 張申府，「呼籲和平」，觀察週刊第五卷第九期（1948年10月23日），頁1。

(107) 儲安平，「我們對於美國的感覺」，觀察週刊第一卷第十一期（1946年11月9日），頁3-6。

(108) 楊人梗，「內戰論」，觀察週刊第四卷第四期（1948年3月20日），頁6。

思想方面我們仍應該追求絕對的自由。張氏的論據是，西方民主國家的資本主義愈長愈大，對內愈見貧富不均，對外愈趨於侵略，而「政治離不了經濟，經濟或反為政治的主幹，於是政治的自由主義就為放任的經濟之故，演至今天，已百孔千瘡了。」張東蓀認為中國為了增產必須採用計畫經濟，尤其必須採取進步的計畫經濟，於是在計畫社會中政治經濟自然沒有絕對的自由⁽¹⁰⁹⁾。張東蓀這種論點的背後，是否有「政治的自由主義→美國→國民黨；計畫經濟→蘇聯→共產黨」的假設，吾人不得而知，不過這些主張放在（前已述及的）他所參與的國家社會黨的黨綱範圍來看，並不突兀。

著名的政治學者蕭公權，在《觀察》撰文「說民主」的時候，即企圖調和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觀念，亦即企圖以民主原則來調和個人自由（意志解放）與人類平等（物質的滿足）；他認為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都是民主，二者的目標有可能調和，這種調和的努力例如英國工黨的社會主義，或中國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都是兼顧民治與民享的民主觀念，既與共產主義有別，也與傳統的自由主義不同⁽¹¹⁰⁾。關於英國工黨以費邊社會主義與勞工運動的結合，採用和平的方式取得政權，似乎成為中國自由主義者嚮往的楷模，當時《觀察》、《世紀評論》等主要的自由主義刊物，都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介紹工黨的路線。進一步說，194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者之重視經濟問題，除了受到國內政局影響之外，同時亦受到二次戰後歐洲國家出現的大企業國有化潮流、凱因斯的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理論、或英國工黨的路線所影響，這也是1940年代中國自由主義可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緣由⁽¹¹¹⁾。

（三）左右開弓與左右夾攻：《觀察》週刊有不少文章同時批評國共兩黨，例如「論『神話政治』——評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一文，認為國共兩黨所行的都是偶像政治、神話政治，而不是民主政治，要改造這種神話政治有賴於某種某種力量云云⁽¹¹²⁾。又如「中國需要重建權威」一文，一方面批評國民黨自己違反三民主義，已失去領導國人重建權威的資格，另一方面批評共產黨黨內人才的學識水準

(109) 張東蓀，「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觀察週刊第四卷第一期（1948年2月28日），頁3-5。

(110) 蕭公權，「說民主」，觀察週刊第一卷第七期（1946年10月12日），頁3-7。

(111) 詳見胡偉希、高瑞泉、張利民合著，十字街頭與塔——中國近代自由主義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06-312。

(112) 周綬章，「論『神話政治』——評國共兩黨的政治領導」，觀察週刊第一卷第廿一期（1947年1月18日），頁5-7。

有限，因而比較期待無黨無派人士出來主持、實踐⁽¹¹³⁾。類此，楊人樞對於自由主義者「兩面不討好」的處境有深刻的自覺：

在目前國共兩大勢力對立的局面中，最現實的態度是「擇一而事」。要兩面討好是不可能的，兩面不討好卻是最不「現實」的，最聰明的辦法是暫時保持緘默，待機而動。自由主義者卻要採取這麼一種既不現實又不聰明的態度，因為……他們的知識決定了他們所採取的途徑。民主態度使他們訴之於說服，由說服而產生的信念必然是很堅定的；故此，自由主義者不致因遭受打擊而放棄其信念，在追求進步的工作中，能時時表現其力量。

(114)

這時候的中共似乎很少抨擊自由主義者的言論，而是由「共產黨的同情者」出手打擊，認為自由主義者崇拜英美式的民主乃是忽視經濟民主，殊不知「一碗飯應當較一張票更重要」；同時又認為自由主義者反內戰，即是「反革命」⁽¹¹⁵⁾。至於來自國民黨方面的壓力，則是明顯而「致命」的，除了 1948 年 12 月的勒令停刊（出至第五卷第十八期）之外，1947 年 11 月初，即因三卷九期的一篇「評蔣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觀察》的發行，後來因各方關切而沒有查封⁽¹¹⁶⁾；其次，當 1948 年夏天，繼南京《新民報》遭受永久停刊處分以後，南京各界盛傳《觀察》週刊亦將遭受停刊處分，該刊查證此一消息屬實之後，儲安平即撰文予以反擊，嘲諷政府方面所希求的「建設性建議」：「請問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麼建設性的工作？……我們一貫的態度是希望結束內戰，這難道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建設性的建議嗎？然而政府能採納我們這個建議嗎？」並且指出政府若真害怕社會動亂而影響政權安定，便應採取有效措施以紓解民困，不應歸咎於報紙雜誌的「煽動」：「老實一句話，今日造成社會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製造社會的不安，而反將其責任嫁移到我們言論界身上，可謂不平之至。」⁽¹¹⁷⁾

雖然《觀察》站在獨立的立場「左右開弓」，但整體而論，仍是對國民黨（

(113) 吳世昌，「中國需要重建權威」，觀察週刊第一卷第八期（1946 年 10 月 19 日），頁 3-7。

(114) 楊人樞，「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觀察週刊第五卷第八期（1948 年 10 月 16 日），頁 3-5。

(115) 同上註，而楊人樞的反駁在另一文「再論內戰」，觀察週刊第五卷第九期（1948 年 10 月 23 日），頁 2-4。

(116) 儲安平，「風浪、熬煉、撐住——『觀察』第三卷報告書」（同前），頁 7。

(117) 儲安平，「政府利刃指向『觀察』」，觀察週刊第四卷第二十期（1948 年 7 月 17 日），頁 3-4。

政府)的責備批評為多。先就一般性的評價而言，儲安平曾概括地說：「二十年來我們的執政黨到底在做什麼工作？一言蔽之，這二十年來國民黨只聚精會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強消極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權的鞏固。」結果當然大大影響到積極方面的建設工作，同時造成道德的墮落，使得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潔身自好、柔弱者頹靡消沈，國家盡失樑棟，社會無復正氣，總之，這是一種「失敗的統治」(118)。次就攸關人權法治的個別議題而言，《觀察》的觸角是敏銳的，例如在1947年12月22日(行憲前夕)，立法院通過一個「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國民政府立刻公布施行，這條例把原來刑法第100條、第101條的罪刑特殊化，提高到最重刑的程度，並且設置「特種刑事法庭」，專司非軍人「犯本條例之罪者」的審判。《觀察》對此一行憲前夕的違憲之法立即發表評論，希望政府早日予以廢止，以示政府行憲的誠意(119)。又如1948年國民大會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有緊急處分權，不受憲法第39條或第43條的限制，亦即可以不受戒嚴法及緊急命令法規定的程序所限制，對此《觀察》有一篇北京大學教授樓邦彥的評論說：「『臨時條款』的制定是十足表現了政府一隻手頒佈了憲典，另一隻手又把它撕毀了。讓我再重覆地說，既拋棄了和平方法來解決國內的政治問題，政府的行憲誠意是永遠無以令人置信的。」(120)樓邦彥認為國民黨政府只是在策略上藉著頒佈憲典來裝點民主的門面，並以之遮蓋內戰的嚴重性，但是憲典的條文對於權力的運用畢竟是一大障礙——尤其在生死關鍵的內戰時期，這就是「臨時條款」的由來。

1940年代末期的中國——依儲安平的說法——國民的心情和思想都一天一天的在轉向變化；本來對政府感覺失望的，漸漸對政府感覺絕望了；本來無所謂的人，也慢慢左傾了；本來仇視共產黨的，也已在努力瞭解共產黨了(121)。這種變化是一種無聲的變化，然而卻是一種重大的變化。《觀察》週刊在這個時刻所發揮的，恐怕是「記錄」的意義大於「匡正」的作用。

三、結論與評估

(118) 儲安平，「失敗的統治」，觀察週刊第一卷第三期(1946年9月14日)，頁3-4。

(119) 芮沐，「行憲前夕的一個違憲之法——論『戡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觀察週刊第三卷第廿二期(1948年1月24日)，頁6-7。

(120) 樓邦彥，「論『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觀察週刊第四卷第十期(1948年5月1日)，頁5-6。

(121) 儲安平，「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同上註，頁3-4。

1946年7月11日，救國會的常務委員、民主同盟的中央執行委員李公樸，在昆明被暴徒暗殺，民社黨的《再生》週刊在當期即有一篇哀悼的短文，提到「或許有人說他是共產黨的尾巴，但是在民主的國家中，就是做了共產黨也不能因政見不同而就把他處死。這真是一種下流的行爲！」⁽¹²²⁾7月15日，也是民盟中執委的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又在昆明被暴徒刺殺。隨後民盟推派梁漱溟、周新民飛往昆明調查，梁漱溟在調查報告書上肯定這件事與國共和談破裂有關，而且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部所主使的特務所爲⁽¹²³⁾。9月1日《觀察》週刊的創刊號上，即以「血與理想」、「求仁得仁」來形容李、聞二君之死，並且對知識界風聲鶴唳的「黑名單」多所描繪⁽¹²⁴⁾。這件事當然使民盟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雪上加霜。但是在蔣介石的認知，凶手湯時亮、李文山兩位中下級軍官是因不滿聞一多「肆意醜詆政府」而「一時以血氣之勇」使然，這樣的始意「至可矜念」，乃是「激於公義而非徇其私仇」，「政府之所以遲遲其欲決而不忍決者，正以此耳。」⁽¹²⁵⁾而胡適，正是在這一年的7月5日自美國返抵上海，他是在前一年（1945年）9月得到蔣介石親電「早日回國主持校務（指北大校長——筆者按），並圖良晤」⁽¹²⁶⁾的情形下回國的。只見他7月29日飛往北平那天，向記者宣稱「中國民主有了進步」⁽¹²⁷⁾，沒有證據顯示，他對李、聞慘案有過任何評論。

周策縱教授曾經認爲，我們應該用容忍和抗議兩個輪子來作爲「爭取自由民主的基本態度和精神」，同時肯定胡適的一生，就是以容忍和抗議作爲他的基本態度與精神⁽¹²⁸⁾。筆者則認爲，胡適思想的文化面和政治面應該分開來看⁽¹²⁹⁾，就文化面而言，胡適的一生相當一致地主張西化，延續著五四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批判精神，包括晚年在台灣發表那篇引起爭論的演講，說到「一個文

(122) 「悼李公樸先生」，再生週刊第122期（1946年7月20日），頁2。

(123) 梁漱溟、周新民，李聞被害真相（香港：龍門書店，1946年），頁12、29、30。

(124) 觀察通訊版，「李聞之死」，觀察週刊第一卷第一期（1946年9月1日），頁22-24。

(125) 秦孝儀編，前揭書，卷六（上），頁240。

(126) 耿雲志，前揭書，頁184。

(127) 同上註，頁186。

(128) 周策縱，「胡適之先生的抗議與容忍」，原發表於1962年的《海外論壇》三卷五期，再轉載於傳記文學第五十五卷第三期（1989年9月號），頁40-48；第四期（1989年10月號），頁104-111。

(129) 汪一駒即認爲，胡適是一個文化上的激進主義者，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Y.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p.417-421。

明容忍像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精神文明可說？」⁽¹³⁰⁾ 這段話被周策縱稱讚為充滿抗議精神，其實也只是在文化層面。若就政治面來看，除了性格上的平情順理、容忍異見之外，胡適對威權政治所表現的抗議精神，則明顯有階段之分，大致說來，中日戰爭可作為其抗議精神由強轉弱的分水嶺，而戰前汪精衛之屢邀作官、與蔣介石的來往⁽¹³¹⁾，以及戰爭期間擔任四年的駐美大使，應該都與此轉變有關。要之，蔣介石在胡適的心目中，從1930年代的「眼中人物」變成1940年代世界六大巨頭裏「夠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¹³²⁾，應該不是蔣介石變了，而是胡適自身的改變。

從本文的描述可知，1940年代的胡適主要是扮演政權的辯護者而非批判者，以致使自我期許的「諍臣」、「諍友」角色亦有些虧欠。然則是否選擇「個人諍諍」類型的自由主義者皆會走上胡適的道路？似也未必，例如傅斯年的人際關係、社會位置與胡適相近，但是他在國民參政會的時候「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他在1947年發表的文章——「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¹³³⁾，皆是擲地有聲之作。

其次，從胡適一生堅持不組黨⁽¹³⁴⁾，多少可以反證張君勱所選擇的「組黨參政」類型，是一項大膽的嚐試。張君勱藉著在野黨身份介入實際政治，尤其在協商憲草的過程中，以過人的耐心、知識與智慧去「調和各黨需要」，「每天晚上為共產黨解釋清楚，白天正式開會，要與國民黨爭辯」⁽¹³⁵⁾。後來他為了民社黨參加國大的事而與民盟失和，並引來嚴酷的批評，但是他自己畢竟不參加國大、不參加政府，應可證明他之所以不「袖手旁觀」，乃是為了「引誘蔣介石一步步的走向民主」的苦心⁽¹³⁶⁾。

胡適的朋友王世杰，曾經在張君勱面前批評「梁漱溟過去與軍閥勾結」，張

(130)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這是1961年（胡適71歲）的一篇英語演講，中文稿由徐高阮翻譯、經胡適校改，全文錄入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十冊，頁3802-3806。

(131) 詳見陳儀深，「胡適與蔣介石」，收入周策縱等著，胡適與近代中國（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1年），頁97-112。

(132) 耿雲志，前揭書，頁192。

(133) 傅斯年這兩篇文章，俱見於觀察週刊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3月1日），頁6-8；頁25-26。惟「這」文原發表於《世紀評論》第七期，經《觀察》轉載。

(134) 耿雲志，前揭書，頁187。

(135) 張君勱，「中國新憲法起草經過」，原載《再生》第220期，收入中華民國憲法與張君勱（台北：民社黨國民大會代表黨部編印，1986年），頁5-7。

(136) 楊永乾，前揭書，頁161。

君勳代為回答說：「中國文人不與軍閥勾結，誰能站得住？」（此言有影射王世杰之意）⁽¹³⁷⁾ 這話其實可以用來為張君勳自己的政治事業作註腳。換言之，關於張氏領導組黨是否「無甚成就」的問題，除了前述他自己的回答之外，吾人以為，那是迷信「槍桿子出政權」的人應該負責的事，也是中國社會的恥辱，而不必由張氏來承擔。若是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社會，知識份子組黨可以訴諸選舉和民意，就不會有1940年代那些民主黨派的悲涼結局。而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知其不可而為之，正是自由知識份子的本色。

最後，儲安平等人選擇「公共論壇」的類型，由於是站在論政而非參政、呼籲和平而非（如民盟一般）奔走和平的立場，應無所謂成敗的問題。比較而言，胡適去擔任國民大會主席，既要推崇憲法草案「已極完善」，不久以後卻又作為「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提案連署的第一人⁽¹³⁸⁾，這些時刻的《觀察》週刊，則去質疑內戰方酣的情況下所通過的憲法是否有效力？才剛開始行憲就要凍結憲法而制定臨時條款，到底所為何來？「危害國家緊急治罪條例」是否違憲？相當表現了一份自由主義刊物，關切人權、憲政、法治諸價值的守望者角色。或許有人以為儲安平對國民黨責備尤多，是否對共產黨抱有幻想？其實在1946年他就說過：共產黨基本上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¹³⁹⁾

中國大陸易幟以後，張君勳一直在異國「花果飄零」，胡適短期在美然後到台灣安享餘年，而儲安平則留在中國，1957年中共進行「整風」之際，儲安平向毛澤東周恩來提出「黨天下」的批評，不久就被定為大右派，遭到免職、勞動改造的處遇，終生未獲平反⁽¹⁴⁰⁾。他們三個人，果真代表了現代中國三種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三種命運。

綜合而言，1940年代中國的自由主義，不若清末民初之際受到時代轉型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把自由理想「納入一個集體主義的架構裏」⁽¹⁴¹⁾，亦不若五四時期的自由主義那般長距離地考慮知識份子參與政治的妥適性，而是在國

(137) 王世杰所言應指梁漱溟昔日在山東推展鄉建運動時，獲得韓復榘的支持乙事。同上註，頁125。

(138) 胡頌平編著，前揭書，第六冊，頁2026。

(139) 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週刊第二卷第二期（1947年3月8日），頁3-8。

(140) 李韋，「儲安平文革中蹈海而死」，傳記文學第五十四卷第五期（1989年5月號），頁40-41。

(141) 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206。

共鬥爭的緊迫氣氛下，必須立刻對內戰問題、憲政與人權法治諸問題採取反應；這時候的自由主義者，比民國以來的其他時期擁有更多影響政治的機會，但是就他們所追求的目標而言，無疑都是遭到挫敗。對於這種挫敗，吾人可以從一般化的角度解釋：自由主義需要秩序，而當時的中國正處於混亂狀態；當時的中國充滿革命與暴力，而自由主義者對此無能為力⁽¹⁴²⁾。吾人亦可以從英國的經驗得知，自由民主的果實是由非常多樣的歷史勢力所造成的，不能完全歸功於自由主義者與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反過來看中國自由民主的挫敗，若完全歸咎於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也是不公平的。⁽¹⁴³⁾然而在達到這些解釋之前，若不能進入1940年代中國的歷史實體，體會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在國共鬥爭下的艱難抉擇，那麼以上的解釋也不免要流於口頭禪。

(142) Jerome B. Grieder, *op. cit.*, p.345。

(143) Eugene Lubot, *Liberalism in an Illiberal Age-New Culture Liberals in Republican China*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2), p.130。